

中国文字学报

第一辑

- 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黄德宽
甲骨文祀奉概称释析·····向光忠
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黄天树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𠄎”字用为“登”证说·····沈培
释彖·····何琳仪 时兵
甲骨文“𩺰”字新释·····杨泽生
- 上博简《相邦之道》1号简考释·····裘锡圭
试说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旃”字·····吴振武
望山遣策车盖文字释读·····李家浩
战国楚简所见病名辑证·····张光裕 陈伟武
从𠄎字的释读谈到𠄎族的来源·····赵平安
六书体用说的渊源·····党怀兴 陈曦
《说文》小札·····杨琳
试论《说文解字》的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陈双新
- 关于《规范汉字表》的研制·····王铁琨
校勘在大型字典编纂中的作用例释·····张涌泉
谈汉字的评价和前途
——《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质疑·····苏培成
论隶变研究的新进展·····陆锡兴
俗文字学与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接轨略说·····张桂光
大型字书疑难字续考·····杨宝忠
古代汉语字频统计研究的新进展·····史建桥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前410组字的测查分析·····邵文利
- 《传抄古文字编》序·····曾宪通
东巴文卖拉舍地契约译释·····喻遂生
传抄古文论著目·····徐在国

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文字学报

第 一 辑

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字学报. 第1辑 / 《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5037-5

I. 中... II. 中... III. 汉字—丛刊 IV. H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5509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WÉNZÌ XUÉBÀO

中国文字学报

(第 一 辑)

中国文字学会《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5037-5/H·1237

2006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定价:22.00 元

主 编 黄德宽

副主编 王铁琨 张涌泉(常务)

顾 问 裘锡圭 李学勤 王 宁 曹先擢 傅永和

编 委 陈伟武 单周尧 董 琨 郭锡良 黄德宽 李国英

李玲璞 林 沅 沈 培 苏培成 王铁琨 吴振武

向光忠 臧克和 曾宪通 张书岩 张涌泉 赵 诚

赵平安

特约审稿人 陈伟武 李国英 沈 培 苏培成 吴振武

张书岩 赵平安 刘志基 邵文利 喻遂生

编 辑 徐在国 陈双新 李晓静

发 刊 词

由中国文字学会主办,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协办,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字学报》现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2003年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会完成了换届工作。在讨论学会工作时,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一致认为,适应中国文字学发展和学术交流的需要,有必要办一个专门的学术刊物。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和热烈响应。但是,经过多方努力我们才发现解决办刊所需要的刊号却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商务印书馆素以出版高水平语言学著作而闻名,近年来他们又设立语言学出版专项基金,出版语言学系列期刊,大力支持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工作。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帮助,这本《中国文字学报》才得以顺利问世。

中国文字这个概念应包括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和现实中正在使用的各种文字,但是一般却将它等同于汉字。这是由于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并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体系,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随着中华文明的传播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汉语言文字还影响到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成为世界上运用最为广泛的主要语言文字之一。《中国文字学报》是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专门期刊,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文字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中国文字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促进国内外文字学界的学术交流,使得中国文字学能在世界上真正享有与其研究对象相称的崇高地位和影响。

这样的目标追求也就决定了本刊将努力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文章内容不论古今,凡以中国文字为研究对象的皆为本刊所兼容;其次,文章著者不分中外,凡矢志于中国文字学学术发展的皆为本刊所欢迎;第三,文

章篇幅不计长短,凡属中国文字学研究之真知灼见、求是证实的皆为本刊所推崇;第四,文章风格不拘一体,凡能遵循学术规范、快人阅读的皆为本刊所认可。简言之,“兼容,开放,求真,多样”将是本刊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文字学报》将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争鸣,鼓励探索,鼓励创新,以使这片园地真正百花齐放,生机勃勃,满园春色。中国文字学会当年成立时,就将“促进国内外文字学界学术交流”、“推动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作为自身的宗旨,主办《中国文字学报》也是我们为实现这个宗旨而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希望中国文字学会的全体会员和关心中国文字研究的海内外贤达,共同支持,共同呵护,使新诞生的《中国文字学报》能够越办越好,像中国文字本身一样历久弥新,永葆生机与活力!

《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

目 录

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	黄德宽(1)
甲骨文祀奉概称释析·····	向光忠(18)
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	黄天树(35)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𠂔”字用为“登”证说·····	沈 培(40)
释彖·····	何琳仪 时 兵(53)
甲骨文“𩺰”字新释·····	杨泽生(60)
上博简《相邦之道》1号简考释·····	裘锡圭(68)
试说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铭文中的“旃”字·····	吴振武(73)
望山遣策车盖文字释读·····	李家浩(77)
战国楚简所见病名辑证·····	张光裕 陈伟武(82)
从尊字的释读谈到尊族的来源·····	赵平安(92)
六书体用说的渊源·····	党怀兴 陈 曦(100)
《说文》小札·····	杨 琳(106)
试论《说文解字》的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	陈双新(113)
关于《规范汉字表》的研制·····	王铁琨(123)
校勘在大型字典编纂中的作用例释·····	张涌泉(136)
谈汉字的评价和前途	
——《现代汉字体系的科学性、简易性》质疑·····	苏培成(143)
论隶变研究的新进展·····	陆锡兴(151)
俗文字学与传统文字学、现代汉字学接轨略说·····	张桂光(164)
大型字书疑难字续考·····	杨宝忠(169)
古代汉语字频统计研究的新进展·····	史建桥(178)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前410组字的测查分析·····	邵文利(185)

2 中国文字学报

- 《传抄古文字编》序..... 曾宪通(199)
- 东巴文卖拉舍地契约译释..... 喻遂生(201)
- 传抄古文论著目..... 徐在国(214)

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

黄 德 宽

提要 文章通过对商代后期甲骨文发展水平的论证,确立探讨商代前期文字的起点,并通过小屯陶文与甲骨文关系的分析,阐明商代陶文对探索当时文字体系发展水平的价值。在全面考察商代前期几批重要陶文的基础上,作者讨论了商代前期文字发展的相关问题,并获得了关于商代前期文字发展情况的基本结论。

关键词 商代文字 甲骨文 陶文 汉字发展

在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商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尚书·多士》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传世文献对商之先人已有典册的记载;殷墟甲骨的发现,再现了商代晚期文字使用的真实情况;而商代考古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的发现,^①为商代前期文字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作为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汉字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②我们认为研究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是一个可靠的起点。由殷商晚期追溯到前期,进而对商代整个汉字的面貌作出合理的推测,是探索早期汉字形成和发展的一条可能的路径。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试图对殷商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作一探讨。

一 由殷墟甲骨文的发展程度看商代前期文字

殷墟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研究者已形成普遍的共识:殷墟甲骨文是现在所知的

① 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② 自上世纪半坡文化等新石器陶文符号公布以来,裘锡圭、李学勤、饶宗颐、高明等都有论著发表。2000年10月中国殷商学会等单位发起召开“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30余位中外学者聚集洛阳,专题研讨交流他们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成果。见《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略述》,《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

汉民族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作为汉字最早的文字系统虽然无异议,但是对甲骨文的成熟程度或发展水平,各家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甲骨文是“很发达的文字”^①,已发展到“成熟完美的符号文字阶段”^②;有的认为甲骨文“还在形成的途中”;^③有的学者则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如裘锡圭认为“商代后期的汉字不但已经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而且在有些方面还显得相当成熟”^④。对殷墟甲骨文发展程度的准确判断,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商代前期汉字发展状态的讨论。

我们认为,确立一个文字符号系统的发展程度,主要应从这个符号系统的构成、符号化程度、符号书写形式、符号功能等方面作出具体分析,并且这种分析应以代表该系统进入成熟阶段的可靠资料为依据,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 甲骨文符号的构成。甲骨文作为汉字符号系统,据研究,单字总数约为 3 700 左右,其中已识字和可隶定字约 2 000 左右。^⑤ 沈建华、曹锦炎经进一步整理得出甲骨文单字数是 4 071 个(其中包括数字和祖先的名字合文),各类异体(实际包括异写)共 6 051 个(含数字、祖先名合文)。^⑥ 以上数字都是在姚孝遂先生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基础上的进一步校订增补。^⑦ 各家差异主要是由一些字形分合处理上的分歧所致。沈书后出,其统计大体“应为可依的数据,由此我们即能更好地评价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⑧。约 4 000 甲骨文单字,反映了甲骨文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定型的古汉字符号系统相比,甲骨文已具备汉字构形的各种类型。传统“六书”中之“四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甲骨文皆已兼备。这表明殷商晚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基本构形方式已经确定,构形系统已逐步发展成熟。^⑨ 如果对各构形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不同构形方式的符号构成能力当时已经各有差别。“象形”大部分来源较早,在殷商之前应已获得充分发展,《说文》所收的象形字,几乎都以单体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第 79 页,齐鲁书社,1981 年。

② 李孝定《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第 40 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该文原载《南洋大学学报》1968 年第 2 期。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第 31 页,商务印书馆,1993 年。

③ 郭沫若《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8 页,人民出版社,1954 年。这种观点到上世纪 70 年代作者已有改变,认为“单就甲骨文而论,已经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系统。”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④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 39—41 页,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

⑤ 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第 75 页。

⑥ 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⑦ 姚孝遂、肖丁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 年。该书将甲骨文单字标号为 3551 字,见该书《字形总表》。

⑧ 李学勤《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前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⑨ 参阅《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同②。

或字符出现在甲骨文之中,而且这种构形方式其后也较少构成新字;“指事”在甲骨文中构形功能微弱,西周即已趋于萎缩;“会意”则保持着其早期特点,尚具有相当的构字能力;“形声”不仅具备了各种类别(注形、注音、形声同取),而且总体上显示出汉字构形的“声化”趋势。^①甲骨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形元素,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为表示具体图像的形体和抽象的符号两类,前者约 150 多个,后者数量更为有限,主要是数字符号和标指区别的抽象符号(后者或称为“记号”)。能用有限的基本形体符号为元素组合构成一整套符号系统,表明甲骨文构形方式已处于较发达的水平。^②

(二) 甲骨文字的符号化程度。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从原始状态到成熟阶段,经历着一个形体符号化的进程,即文字符号从较为原始的图形,逐步简单化、线条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适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化进程及其达到的程度,也是判断一种古老文字符号系统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③甲骨文形体符号的发展程度,姚孝遂师曾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考察,结论是“甲骨文虽然在文字形体上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原始图形的色彩,但从整个文字体系来看,其形体已经经过了符号化的改造,无论在线条化还是在规范化方面,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文字形体的区别方式与手段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以后的各种文字体系,在形体区别方式和手段方面,都是遵循着甲骨文所奠定的基础而有所前进和发展,这仅仅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加深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和超越”^④。这个结论符合甲骨文符号化的实际,我们无须再进行重复的论证。

(三) 甲骨文字符号的书写形式。汉字创造发明过程中形成的书写习惯,决定着它不同于其他民族古文字的独特书写形式。就单字而言,不管单体符号还是组合符号,都追求对称均衡、重心平衡,以二维结构平面展开。在汉字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线条形式虽有不同,但这种结体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就书面语言的书写形式看,直行排列,自上而下,是汉字长期沿袭的传统,直到 20 世纪这一传统才被改变。从甲骨文看,这在当时就已经是一种通行的书写形式。适应这种书写形式的要求,一些字的形体转向 90 度取纵势,从而改变了客体象形符号的重心方向。如源自动物的形体取纵向“变成足部腾空”,有些形体如水、弓和床形等都改变客观形态而竖立。“直行”、“纵向”两种书写现象,表明甲骨文时代汉字的书写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汉字直行和

①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3 期。

②④ 参阅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辑,中华书局,2000 年。

③ 参阅姚孝遂《古文字符号化问题》,《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 年。

纵向的格局已基本确定。^①

(四) 甲骨文字符号的功能。文字符号系统记录语言的功能,是判断其成熟程度并与其他符号系统相区别的唯一标准,这是由文字的属性所决定的。甲骨文记录殷商后期汉语的情况,在甲骨文研究早期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曾经认为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用途的文字,并不能反映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随着对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甲骨文语法现象和词汇系统研究的全面展开,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甲骨文作为殷商时代语言的记录,在汉语发展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价值。^② 管燮初从句法和词类两方面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发现甲骨文的句子结构及其类型、词类及其功能,大体与后代汉语相近,认为甲骨文是以殷商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③ 这一看法,其后经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定论。^④ 作为记录当时口语的书面语,甲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功能自然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伊斯特林认为:古代汉字是一种“表词文字”,“表词文字是这样一种文字类型,它的符号表达单个的词”。“表词文字表达的言语划分为词;它还经常反映词的句法顺序,在许多情况下也反映言语的语音。”作为词的符号的表词字分为两类,一类表词字直接与词的意义相联系,另一类直接同词的语音方面相联系。^⑤ 甲骨文字符号的功能与“表词文字”说的上述理论基本相符。从字与词的对应看,一个甲骨文字书写符号代表的是一个词;从构形方式以及与词义发生联系的途径看,这些文字符号一类是从形意关系入手构成形体符号(象形、会意、指事),一类则是从形音关系入手构成和选定形体符号(形声、假借)。实际上,要实现记录汉语的功能,除符合言语的语法结构外,丰富的虚词和许多抽象的概念,使甲骨文字建立字词对应关系(或称以单个符号表达单个的词)必然要走上表音的道路,表现在甲骨文中就是假借的普遍发生和形声字的涌现。甲骨文常用字中假借字差不多占 90%,随机抽样统计甲骨文假借字占 74%左右。^⑥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 40 页,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中国语文》1992 年第 5 期。

② 参阅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七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③ 管燮初《甲骨刻辞语法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53 年。

④ 参阅《甲骨学一百年》,第 270—280 页;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 年。

⑤ [苏]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王荣宅校《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 34—3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

⑥ 据姚孝遂师统计。他曾提出从甲骨文字符号的实际功能来看,甲骨文是记录当时语言的完善的符号系统,已发展到表音文字阶段。这一新说曾引起过热烈讨论。参阅《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展望》(《古文字研究》第 1 辑)、《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 4 辑)、《再论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 17 辑)、《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 20 辑)等论文。

甲骨文的形声字虽然数量不多,但所体现出的构形与字音的结合及“形声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① 根据现在研究所获得的认识,甲骨文字的符号功能确实已发展到能逐词记录殷商语言,并能表现语言的语法规则和特点(如语序、虚词和基本句型结构等),应该是一种功能完善的文字符号系统。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观察,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甲骨文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它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符号,也是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汉字进入成熟阶段的体系完整的文字样本。这个结论并不否定汉字在殷商时期仍然保留着某些原始色彩,因为它依然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作为一个体系的成熟,与体系中有关构成要素尚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不矛盾,因为即便是早已经历漫长发展历史的成熟文字体系也还会不断发生这样的变化。对殷商晚期甲骨文成熟程度的基本评价,使我们有理由将它作为推求商代前期汉字发展水平的基点。问题是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经过何种环节,汉字才能发展到甲骨文所呈现出的这种成熟状态,这是我们应该去探索和回答的。董作宾比较甲骨文与纳西象形文字的发展情况后,认为运用甲骨文距离汉字的创造当已有悠久的年岁,其创始的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② 郭沫若甚至断言:“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代,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③ 裘锡圭则认为“汉字形成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夏代(约公元前 21—公元前 17 世纪)”;“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很可能也就在夏商之际”,即在公元前 17 世纪前后。^④ 虽然诸家都认为汉字远在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前早已出现,但是对汉字创造和形成完整体系的具体时代还有很大分歧。

二 商代前期陶文资料的若干发现

甲骨文的发展水平为我们推测商代前期(约公元前 17—公元前 14 世纪)汉字面貌提供了基础,而地下文字资料的发现才是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由殷商甲骨文向上追溯,已公布的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主要有:小屯陶文、藁城台西陶文、清江吴城陶文、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陶文等,这些陶文在李孝定和裘锡圭等人关于汉字形成和发

① 姚孝遂师在 4 页注⑥所列诸文中对形声字的结构特点和形符、声符的功能也有充分论述。

② 董作宾有《从么些文(即纳西文)看甲骨文》一文,参阅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40 页所引。

③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④ 《文字学概要》,第 38 页、40 页,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

展演变的讨论中,都已作过分析论述。^①近年来,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又有重要的新发现,这里有必要作一次全面的清理。

(一) 小屯殷墟陶文:主要是 1928 年到 1936 年考古发掘所得,时代为商代晚期,大体与甲骨文相先后。共有有字陶片 82 片,单字 62 个。经李孝定考释,这些字可分为七类:(1)数字,(2)位置字,(3)象形字,(4)人名或方国,(5)干支,(6)杂例,(7)未详。^②尽管这批陶文主要源于商代后期,而且与甲骨文相比数量有限并十分零散,但是通过对出现于汉字成熟阶段陶文的特点及其与同时代通行文字关系的观察,对我们探索商代前期文字,尤其是以陶文为主的资料,将会有重要的启迪。比如,这批陶文大部分刻在器唇上或外表近口处,少数刻在腹部或内表,也有刻在足内的。多以单字出现(也有两字以上的,多的达 7 字),有的字是入窑前刻在陶坯上的,可能为陶人所作;有的则是烧制成器后刻画的,大概为用器者所为。与甲骨文比较考证,50 多个可识字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在甲骨文已成为成熟文字的商代晚期,陶文的使用仍以单个形式出现为主,成行或两字以上极为少见,字的形体与甲骨文大抵相同,内容以记数、标记位置和记名称(人名、氏名、国名)为主。这些启发我们,早于殷墟的其他新发现的陶文资料,如具有以上相似特点,自然可以作为它们所处时代汉字的样本,进而推测它们与所处时代通行文字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介绍并非商代前期的小屯陶文的理由。李孝定对史前陶文与汉字起源及演变的研究,显然也在以上方面受到小屯陶文的启发。^③

(二) 藁城台西陶文:台西陶文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早于殷墟小屯陶文,其时代早期相当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上层与邢台曹演庄下层之间,晚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文化前段。^④遗址早晚两期居址中共发现 77 件陶器上刻有文字符号,文字符号都是未烧制之前刻画,一般只有一个单字或符号,也有两个字和符号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数字符号,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似乎表明器物成套的关系;一类是族氏和人名,如“臣、止、己、己、丰、乙、鱼、大、刀、戈”等。此外,尚有

① 参阅《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所收有关论文和《文字学概要》有关章节。

② 小屯陶文见《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孝定对这批陶文作了全面考释,并在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论文中多次论述了这批陶文。《小屯陶文考释》及陶文拓片图版和相关论文,均收入《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

③ 参阅《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最早陶文的观察推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等文,均收入《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6 期。

一些不识的文字符号。^①季云对1973年在台西村商代遗址中获得的12片陶文进行研究,并与郑州、安阳所出商代陶文进行比较,认为台西陶文与殷墟同类陶文有一定承袭关系,推测台西陶文基本反映了遗址时期通行文字的特征。12片陶文有7片年代较早,较晚的5片也不会迟于殷墟早期。相对于发掘面积而言,陶文的分布也是相当密集的。因此,他认为“台西时期的文字正是殷墟文字的前行阶段。”^②藁城台西陶文早于殷墟,其字形与甲骨文可以相互印证,使我们从殷墟之外看到了更早的文字资料,可由此推断,河北藁城遗址的陶文是当时该地通行汉字的珍贵遗存。从陶文简练的线条,流畅而率意的书写,可以略窥当时文字使用和发展的水平。

(三) 吴城陶文:吴城陶文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于江西省清江县西南35公里处的吴城村。该遗址是长江以南的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遗址。遗址一期的时代相当于殷商中期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殷墟早、中期,三期相当于殷墟晚期。从1973年冬到1974年秋三次进行发掘,发现刻有文字符号的器物一期14件(一件采集),刻画39个文字符号;二期16件,刻画19个文字符号;三期8件,刻画(或压印)8个文字符号。三期共计发现刻画在38件器物上有66个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有单字的,也有两个以上文字符号组合的,最多的达12个文字和符号。^③1975年第4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文字符号,连同1974年冬、1975年冬和前三次出土遗物中继续发现的材料,据考古报告报道共有陶文77个,其中一块陶片上有11个文字和符号,其余大都是单字,刻画或压印两个字的只有两三例。与前三次发掘相同的文字有“五”、“矢”、“在”、“戈”、“大”等,也有不少是新见的。^④唐兰对吴城文化遗址的性质和文字进行了探讨,认为商代清江可能是越族的居住地,吴城文字符号中一些截然不同于商周文字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已经遗失的古文字。^⑤吴城遗址及其陶器和石范上的文字符号,是文字发展研究方面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材料,关系到对这个遗址性质的认识和文字符号的理解。如戴敬标认为:吴城陶文是反映南方地区折草占卜的文字记录。^⑥李孝定不同意唐兰对这批陶文的看法,认为:“当时吴城的居民,其语言文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② 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年第8期。

③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④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⑤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⑥ 戴敬标《南方古代占卜初谈——兼谈对吴城陶文的识辨》,江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1986年)。

字和汉民族本就相近,其相异是文字未达到约定俗成以前的现象,其相同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批陶文和前此的各期陶文,及后乎此的甲骨金文,原就是一脉相承的。”^①吴城陶文中确实有一部分与汉字差别较大,如一期泥质灰陶钵(74秋T7⑤:51)器底上的7个文字符号、泥质黄陶孟(74秋T7⑤:58)器底上的5个文字符号,“作风比较独特,似乎不属于商文化的系统”^②。但是,有许多陶文无疑属于商代汉字系统,其中一些可与台西陶文相印证,一些可与商代晚期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比勘。正确的看法,可能是当时的清江地区既通行商代的汉字,接受商代文化的强大影响,也保留着地方文化的某些要素,包括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民所创造的文字。我们更为重视的,是在商代中期就已经使用并延续到商代晚期的与商代文字有关的陶文。这些陶文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一期泥质黄釉陶罐(74秋T7⑤:46)肩部一周的文字和泥质灰陶钵(74坝基西区取土采集)器底上的文字,它们是成行的,前者有8个字,后者有4个字,似乎可以连读。陶罐实际共有12个文字和符号,还有4个较小符号刻在上方弦纹中,似乎不是文字。唐兰认为这个陶罐的文字与商周文字无疑是一个体系,并将其中的几个字释作“止、豆、木、帚、十、中”等。^③李学勤试读为“帚臣燎豆之宗,仲,七”,怀疑“帚”是地名,“燎豆”是人名,这是一件祭器。^④这个解释作者后来又有所改变。陶文的释读还涉及顺序问题,赵峰主张以“中”字为句首。萧良琼认为可读为“中宗之豆,燎臣帚,七”。“中宗”就是仲丁之子祖乙,“燎臣”是官名,“帚”与见于甲骨文中与“我”相近的南土方国“帚”有关,在今清江吴城附近。^⑤饶宗颐认可萧良琼的读法,将这个成句的陶文重新标点为:“中宗之豆,燎。臣帚七。”^⑥另一件采集所得的重要器物一期灰陶钵底上的四个字是分两行排列的。唐兰(1975)考释左行为“帚田”,指出“卜辞文字常用帚作妇字”;右行后一字可能是“且”字,“商代常用且来代表祖字”。李学勤(1978)则释作“帚田人土”,猜想“帚”是地名,“田人”即官名“甸人”,“土”是人名;后来他又有所改变。萧良琼(1996)将陶文理解为“在帚地的甸人之官在社庙用的祭器”。尽管对这两件陶器的文字读法和理解还可以讨论,但是有两点

① 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第217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37页,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③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④ 李学勤《谈青铜器与商文化的传布》,原载1978年5月1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⑤ 参阅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一文,李学勤、赵峰说也见该文所引,收入《尽心集》第92—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⑥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第57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年。

已成为共识:一是它们属于与甲骨文一个系统的商代中期的文字,二是器物 and 文字记录的内容与祭祀活动有关。除这两件文字可以成句的陶器外,刻有两个字的红色粉砂岩石范(74ET13H6:23)也很重要,殷墟卜辞中读作“又、有”的那个字出现在石范上。^① 上述两件陶器和石范上的文字显示,吴城陶文不仅有记数和记族氏名的,更有记事性质的文字,这说明商代中期汉字就已进入成熟阶段,并且这一点由当时汉字使用者和使用区域的广泛性,来进一步的印证。这些陶文绝大部分是在陶器成坯后,烧制或施釉之前刻画上的,字形草率急就,显然是出自陶工之手;吴城地处长江以南,其遗存虽然保留了浓厚的地域色彩,但汉字的普遍使用反映出商王朝势力扩展带来的文化影响广泛而深刻。^②

(四) 新干陶文:这批陶文 1989 年出自江西省新干大洋洲乡商代大墓。该墓出土陶器和原始瓷器完整的和复原的达 139 件,在折肩罐、原始陶瓮、硬陶大口尊等陶器上刻画有陶文,一般是单字,也有两个字的,大部分刻在器肩部,也有刻在底部的,主要有“五、七、十”等数字,重复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戈”字,其字形与吴城陶文基本相同。另外还在 XDM:511 号硬陶折肩罐和 I 式 XDM:503 号原始瓷折肩罐底部出现了一个“晶”字,在原始陶瓮 XDM:534 和 XDM:535 两器的肩部出现“戈革(?)”两字连写的陶文。^③ 这个遗存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其中青铜器达 475 件,玉器有 754 件(颗)之多,规格非常之高,墓主人可能是地位很高的统治者。新干商墓有较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属于清江吴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些刻画有文字符号的陶器与吴城二期所出相类,文字符号也大都相同,墓葬的时间相当于商代后期早段。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证明在吴城文化分布区域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这种文明既有地方特色,也受到中原商代文明的强烈影响。^④ 新干陶文与吴城陶文的一致,既表明商代中原文明对地处长江以南的吴城地方文化的影响,也证明商代中期到商代后期早段汉字在这一区域内的广泛使用和流行。这为我们评价商代前期汉字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五) 小双桥陶文:小双桥陶文发现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的小双桥村商代文化遗

① 见 8 页注③唐兰(1975)文图六,这个字也发现于郑州二里岗遗址,详下文。

② 参阅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之《李学勤卷》,第 110—120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

③ 参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所编《新干商代大墓》图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九、九〇等,文物出版社,1997 年;“戈革(?)”释文,参阅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原载《文物》1991 年第 10 期,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之《李学勤卷》。

④ 参阅李学勤(1991)《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